

蒋星煜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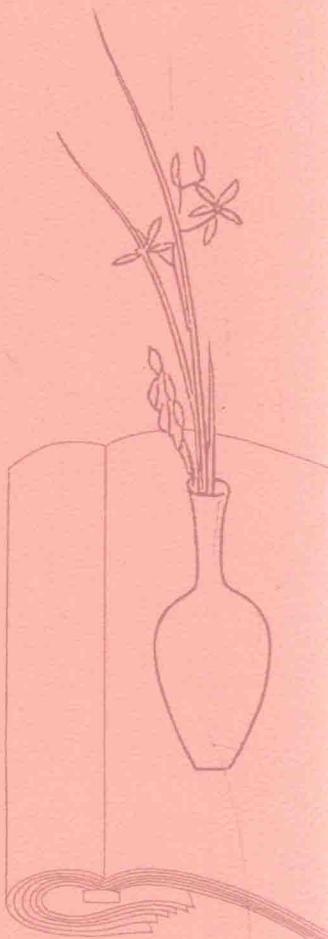
# 蒋星煜文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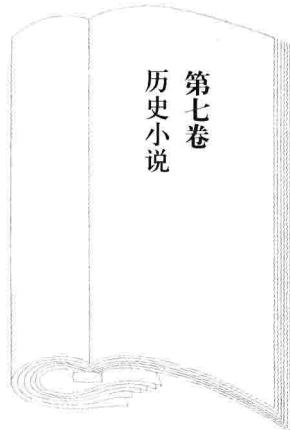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第七卷  
历史小说



蒋星火文集



蒋星火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**

蒋星煜文集. 第 7 卷, 历史小说/蒋星煜著. —上  
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 - 7 - 208 - 11621 - 4

I. ①蒋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蒋星煜—文集②历史小  
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C53②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08463 号

责任编辑 杨柏伟 周 珍

封面设计 王小阳

**蒋星煜文集**

——第 7 卷 历史小说

蒋星煜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× 1000 1/16 印张 329.5 插页 40 字数 4,900,000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11621 - 4/Z · 188

定价 980.00 元

(全八册)

蒋星煜文集

第七卷  
历史小说



蒋星煜随萧军、姚雪垠等参加历史小说座谈会于湖北东坡赤壁（1986年）



上海市戏剧节评委会会议，前排左三起依次为：王啸平、黄沙、蒋星煜、任德耀、何慢、丁是娥、严明邦（1985年）



应故乡溧阳县文联之邀，蒋星煜回故乡进行文化交流，并作学术讲座，由路发今主持（1986年）



应天津电视台之邀，研讨关汉卿杂剧之改编电视剧问题。左起依次为：魏明伦、蒋星煜、吴祖光、赵耀民（1991年）



1993年春，（左起）叶永烈、夏画、蒋星煜、朱践耳在海口



1993年，(左起)曾永义、黄钧、蒋星煜合影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大门前



2008年，为上海戏剧学院宋光祖教授(左二)的博士生张泓(左一)主持论文答辩会，另四位为齐森华(左三)、金登才(右三)、叶长海(右二)、陆军(右一)

## 目 次

历史小说 .....	1
刘伯温的寓言 .....	545

# 历史小说



## 序 一

1935年，鲁迅先生写的《故事新编》结集出版，是有感而发的。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弥漫全国，到处大兴文字狱，有志之士被剥夺了言论自由，不得不弯弯曲曲地“借古讽今”，针砭时弊。这同“四人帮”所炮制的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，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，再来那么一套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，矛头所向无非是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浑水摸鱼，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已。

历史不可能重演，但往往出现许多惊人的类似，走着弯曲的道路。历史是人类以往实践的总结和记录，继往开来，前因后果，完全有规律可循，绝非像唯心主义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，好像是一个什么被任意打扮起来的女孩子，全然是被动的、偶然的。我们学习历史，是为了明辨是非善恶，古为今用，而有所借鉴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不外乎两条：一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；二是考察它对现实生活还有什么意义。从而增加见识，提高智慧，联系历史事实，加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；同时也从今天的实际出发，去验证历史的真实，从中得到教益。我们应当提倡和发扬这种“学以致用”的良好学风。

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，构成了人类历史的长河。人类的历史是以生产活动、政治活动（包括阶级斗争）、科学文化活动交织而成的。毛泽东同志把它概括为：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一句话，揭示出人类历史的本质所在。中国历史悠久，我们祖先出过许多杰出人物，其中有伟大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……在整个中国史册上，展现着忠与奸，善与恶，美与丑，真理与邪恶的斗争。凡是属于忠的、善的、美的和掌握了真理的，都代表了人民的希望，闪烁着耀眼的光

辉。只有像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那样一小撮反革命阴谋家，才有目不识泰山，不惜歪曲历史事实，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，诬蔑中国历史漆黑一团，甚至把海瑞贬得比严嵩还坏。“洪洞县里无好人”，正说明了他们极其阴暗的心理状态，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光亮的。

我常惊叹中国传记文学之发达。司马迁的一部《史记》，刻画了多少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，个个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《二十四史》几乎是以人物传记把骨架支撑起来的，明君、昏君、清官、贪官、外戚、游侠、俳优、盗贼（官逼民反）、文人学士以及三教九流，无所不包。至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等说部，就更加出色了。

蒋星煜同志所写的《历史故事新编》，共十五个短篇，从汉唐到宋明，截取了历史人物的一个片段、一个场面、一件事情，或正史，或别传，或轶事，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有对传统礼教的蔑视，有对社会丑恶的鞭挞，有悲欢离合，有慷慨悱恻，充分表现了人间正气。篇幅虽长短不一，但莫不剪裁得体，穿插有致，富于生活情趣。这种用文学手法叙述描绘的历史故事，很像中国的水墨画，独树一帜，不愧为文苑新开放的一朵鲜花。一口气读下去，犹觉余音缭绕，意味隽永，这值得认真向读者推荐的。当然，决不能“按图索骥”，以为所有细节都必得符合历史事实。尽信书不如无书。对于新编的历史故事，是不能这样苛求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也就不妨作为文学创作来欣赏了。

以上一席话，是否搔着了痒处，最好还是请读者亲自去揣摩吧。但是我总希望，像《历史故事新编》这样别开生面的读物，今后能够不断地出现，使中国传记文学的园地，更加丰富多彩，更加生气蓬勃。

罗竹风

1979年12月25日

## 序 二

我读过很多星煜同志的戏剧研究论文，非常钦佩他的博学多识，提出新见解的勇气。但直到这次先睹为快地读到了这批历史小说，才知道他在小说创作方面，还有这么多的成绩，而且从事此道，已有四十年之久了。他的用心之深，精力之强，实在难得。

正像写历史剧一样，写历史小说很不容易。虽然写的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有些事情大家都已听说过或读到过某些原材料，但要把它写成文艺作品，不是简单地照搬，而要能用现代人的眼光，揭示出过去事情、过去人物活动对今天生活的新的意义或启发，如果缺乏对历史的熟悉、对历史人物的生动理解、对艺术表现的诸多才能，以及对当代生活的关注和洞察，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这是一种再创作的艰苦劳动，实际是一种新的文艺创作，它拥有大量读者，决不是偶然的。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远比正史中的《三国志》大，尽管前者并不能代替后者。后者主要给读者历史知识，前者则除此以外，还活生生地写出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性格，正是这些独特的描写紧紧地抓住了千百万读者的心。尽管小说作者的倾向已不再能左右我们，它的艺术魅力无疑还是很强，因为中间毕竟仍保留着许多并未成为过去的东西。

我们谁不知道曹操？由于对这个历史人物向来有褒有贬，对所褒所贬又不断因时代变异在翻案，所以可能每一位读者心目中都有一个不尽相同或很不相同的曹操。曹操本人性格的复杂性加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，会出现这种复杂情况并不奇怪。舞台或小说中出现若干个不同的曹操形象没有什么坏处，这也可以使我们学会多方面来理解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，得到比只从一个方面一种角度来评论时更完整一些的认识嘛！本书中的《捉刀人曹操》就是从多谋好妬这一角度来写曹操这个人物的。

包括华歆和崔琰，作者对他们的心理描写细致微妙，而且是顾到了他们之间的固有关系，虽有褒贬却还是符合他们相互关系和性格逻辑的。这不仅能给读者艺术享受，实际上通过文学作品可以给人以一种思维训练力量，让人增加对社会对各种人物的某些理解。《马锦演戏》是对《马伶传》的扩充和再创造，不仅很有趣，也可说明古人对深入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是颇有了解的。

作者在他的每一篇再创作中总想把某种进步的、健康的、对现实生活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包含其中，我很赞同这一做法，即使成为一个作家自觉的意图，我认为也是毫无损于任何审美价值的。我不认为一个人真能脱离实际社会而“超越”，如果是有价值的“超越”的话。“超越”而必然要以“压抑”别人为代价，这实际是品格卑下的表现。古人早知“越世高谈”之无益了。一味想“空灵”，至少必流于萎弱，不吃人间烟火食的神仙，哪里有？力量小些不要紧，社会责任感不能没有。

星煜同志这些历史小说深入浅出，相信会雅俗共赏。有幸先睹，我只能略表读后的喜悦之感，读者同志一定能从中体会到更多的教益的。

徐中玉

1987年7月7日

## 序 三

上下几千年、纵横几万里的华夏古国是历史故事的发祥地。那一代又一代“白得词，念和诗，说得话，使得砌”，具有“理、味、趣、细、技”特征的讲故事说话艺术，曾使多少国人为之倾倒！然而，就像任何艺术都是富于时代性一样，历史文学也是与时代对话的一种艺术。同样是历史故事，它到了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新编。何况，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型的历史文学，它在历史观、哲学观、艺术观方面要超越以往的历史文学达到时代的高度，这就更加重了其新编的任务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今天的历史文学都可以称之为“故事新编”的。

当然，我们在这里不想将“故事新编”的概念定得太空太泛。只是权作对故事性色彩较浓的这一类作品特别短篇作品的别称。这样，定义虽然狭小些，但具体的能指反倒可能多些。这也是笔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一贯主张和思路。

在当代历史文学领域中，我认为蒋星煜历史小说就很具这样的特点。他的创作，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第一个作品《嵇康之死》，到前些年发表的《捉刀人曹操》，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历史短篇小说领域一步，简直可以称得上历史短篇创作执著的“专业户”。从叙述和艺术表现上看，他的作品文虽质朴但却相当形象生动，有趣有味；运笔虽粗线条些甚而近乎“速写”，但文到点到，表现力强而又富有可读性。或许是这个缘故吧，他将他的第一个集子命名为《历史故事新编》。这里也道出了他历史短篇的一个特点：讲求故事性，讲求通俗化。他的另一个历史短篇集子《公主的镜子》也是如此。每个作品都有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框架。作者仿佛是一个诙谐风趣的年长智者，在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那遥远的往昔……

作者这种写法，与鲁迅先生的《故事新编》显然是不同的。同样是“故事”，鲁迅的着眼点不在故事本身的叙述，而是旨在形而上思想寓意的嵌入。他关心的是故事以外的意象、抽象的东西。鲁迅当时这样写，是出于战斗需要的考虑，但却无意为我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。当鲁迅将古今交融起来进行描写，让大禹时代的人漫口“good morning”，谈论莎士比亚，周朝的人嘴里吐出“文学概论”、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他实际上已经把小说的故事框架打破了，而将其转化到非逻辑的、富有隐喻层次的艺术世界。而蒋星煜的“故事”描写不然，他力求严格地按照时空的逻辑顺序推进演绎。在他笔下，故事所赖以衍发的典型环境，唐宋各异，明清有别，它们彼此都有质的定性的东西。例如，《挂剑》所写的春秋战国民情世风与《司马迁著书》所状的汉代人文风习就见出差异。前者古朴纯真，带有早期礼义之邦原始朴拙的特点，后者虚伪阴冷，已经颇明显地呈露出专制统治所催生的那可憎可怕的一面。尽管作者在具体的艺术活动中，一般并不注重作品故事外壳具体而微的景观细描，但是透过他的富有表现力、概括力的有关描写，我们还是不难把握到作品那独特的时代氛围。同样是“故事新编”，作者和鲁迅的做法，确实有殊态异姿之差别。

大概由于寓意的浓泡漫浸，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更带有抽象的理性化的特点。他们与其说是实在的形象本体，不如说“寓言”的符号载体更为确切。说鲁迅的“故事新编”塑造了“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”，我以为并不合乎事实，也未见得就是对鲁迅的真正称道。我这样说可能有点“大不恭”，但这样的“不恭”或许更契合“古今交融”这种特殊类型历史小说的实际，免得将它与我们常见的历史小说“一锅端”。蒋星煜的作品不同于鲁迅的“故事新编”，他殚精竭虑地追求人物形象的具体性、实在性。酷肖逼似，形神兼备，是他自觉派给自己的神圣艺术使命。他所描画的各色人等，从帝王将相的汉武帝、李世民、曹操、季札、霍去病、诸葛亮、包拯，到才子佳人的司马迁、王勃、白居易、汤显祖、乐昌公主、况夫人，以及三教九流、五行人作如马锦、哑子、秦景明、月空和尚、过百龄等，在小说中都是通过实实在在的“像”表现出来的。其中有些人物有情致、有神态，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很强的客观性和确定性。譬如他写于 1962 年的、后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因此获祸的《李世民与魏徵》，就具有这样的特点。这个短